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著
张妮莹 张俊彪 译



菊与刀



菊与刀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著
张婉莹 张俊彪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菊与刀/[美]本尼迪克特(Benedict, R.F.)著;张妮莹,张俊彪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12
ISBN 978-7-5125-0132-4

I. ①菊 II. ①本 ②张 ③张 III. ①文化—研究—日本 ②民族心理—研究—日本 IV. ①G131.32 ②C955.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2426号

本书根据美国马萨诸塞州河叫出版社1946年出版之英文版,并参照日本社会思想社1972年出版之长谷川松治日译本译出。

菊与刀

作 者 [美] 鲁思 本尼迪克特
译 者 张妮莹 张俊彪
责任编辑 艾 迪
统筹监制 古 雪
策划编辑 郎爱民 许 怡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市场推广 张 蓉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6开
18.75印张 200千字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132-4
定 价 28.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本书的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887 ~ 1948 年）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者。她最擅长以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原始宗教、神话和传说，写了不少颇有影响的著作。本书是她晚年（一九四六年）的一部杰作。

在本书中，作者以极其丰富的资料生动地叙述了日本社会特殊的等级组织和等级观念，日本人的“恩”与“报恩”、“义理”、“名誉”、“人情”思想，他们的道德观念以及他们如何教育孩子等许多方面，细致入微地刻画出日本人在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整体形象。并且，作者把着力点集中于探讨日本人许多行为和思维方式的相互内在联系上，把种种行为和思维方式作为一个整体结构的链条或环节来把握，从而深刻揭示出日本人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

一九四八年，长谷川治教授将此书译为日文，介绍给了日本读者，在日本大为轰动，而且几十年来一直受到日本读者的欢迎。日本著名学者川岛武宜教授评论说：“读过本书的许多日本学者，至少我所知道的，都交口称赞它的资料丰富。”“本书具有至今那么多（外国人写的有关日本的）书都没有的新鲜感受和深刻尖锐的分析。我希望所有的日本人都要读这本书。”（《评价与批评》，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号《民族学研究》，一九七二年附入本书的日文修订版。）

毋庸置疑，《菊与刀》一书早已成为全世界研究日本文化的重要参考著作，可谓经典。在国内，此书也有众多中译本出版。然而，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就在于它的长盛不衰。故此，为飨中国读者，我们找来本尼迪克特于一九四六年出版之英文原版，并参考其日译本，将此书译出。书中注释，以英文版中作者原注为主，间或补以译者注。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未尽之处，敬请指正，不胜感激。

致 谢

在日本出生并受教育，却在战时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人，无论男女，都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地。许多美国人都不信任他们。然而在此，我却十分高兴为他们作证，证明他们曾在我搜集此书素材时十分友好，并提供了帮助，非常感谢他们。尤其感谢我战时的一位同事 **Robert Hashima**，他生于美国，长在日本，一九四一年时选择返回美国。他曾在战时安置营实习，当他返回华盛顿，供职于美国一家战时机构时，我们相遇了。

我还要感谢战争信息办公室，是他们给我布置了这项任务，也就是我书中所写的内容。尤其感谢负责远东地区的副主任 **George E. Taylor** 教授，还有率领外国道德分析部门的 **Alexander H. Leighton** 指挥官。

我还想感谢已经部分或全部阅读了此书的人：**Leighton** 指挥官，**Clyde Kluckhohn** 教授，**Nathan Leites** 博士，当我埋头于日本研究的时候，他们都在战争信息办公室工作，从很多方面对我给予了帮助；还有 **Conrad Arensberg** 教授，**Margaret Mead** 博士以及 **Gregory Bateson** 和 **E. H. Norman**。感谢所有人给我的建议和帮助。

鲁思·本尼迪克特

目
CONTENTS
录

致谢

第一章 研究课题——日本 /1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19

第三章 各得其所 /39

第四章 明治维新 /65

第五章 负疚于社会和历史的人 /85

第六章 报答不尽万分之一的恩 /101

第七章 “义理最难忍受” /119

第八章 洗雪污名 /129

第九章 人情的世界 /159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177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209

第十二章 孩子的教育 /233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275

第一章

研究课题——日本

迄今为止，美国以往历史上历次举国而战所遇到的对手中，日本人是难以琢磨的敌人。这是因为过去与大国对手作战时，还从来没有迫使我们考虑到对方在行动上和思想上有那么多令人费解、极其矛盾的习惯。在我们之前，沙俄曾于一九〇五年同日本进行过战争。我们与日本的战争，纯粹可以看做是和一个不属于西洋传统文化，而彻底武装起来加以训练的国家所进行的一场战争。被西方国家公认属于人类天性而普遍接受的战争惯例，显然不被日本人所接受。为此，在太平洋战争中，我们不仅要进行一系列海岸登陆作战，解决军队的输送、设营、补给等棘手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搞

清敌人的性情。为了对付敌人的行动，我们必须理解敌人的行为。

当然，要理解对手困难很大。日本打破闭关锁国政策后的 75 年间，在有关描述日本人的论述中，“然而同时他又是……”这样奇怪至极的提法屡见不鲜。这样的词语，无论对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进行论述时，都几乎未曾使用过。一个一丝不苟的观察家，在记述非日本民族时，说其是一个彬彬有礼而出色的民族的同时，很少要补充说，“然而他们又是傲慢自大的”。在记述某个国家的人民时，从来不会说他们是顽固守旧的，“然而他们又极易接受新奇的事物”；不会说某个国家的人民是顺从的，“同时他们又是极不服从上边统治的”；不会说他们是忠实宽容的，同时又说，“然而他们又是不忠实而又心术不正的”；不会说他们是非常勇敢的，“同时又是极其胆小怯懦的”；不会说他们一方面因为顾及别人的评价而谨慎从事，同时“又有令人吃惊的自我意识”。当描述一个国家的军队时，不会一面说他们的士兵个个训练有素，一面又说他们不易服从命令，甚至有时公开进行反抗；不会在论述一国的国民是如何热衷于西方学问的同时，又详细地记述他们狂热的保守主义。于是，当你打算写一本日本民族是如何欣赏美好事物，崇敬演员和艺术家，竭尽技能种植菊花的书时；你还得同时写一本书，补充叙述他们又是如何崇尚战刀，把最高荣誉归于武士这一事实。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是罕见的。

然而这一切矛盾交织成了关于论述日本问题的经纬，这一对对

矛盾却又都是真实的。无论战刀还是菊花，都是这幅图画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人极其爱争斗的同时，又非常温顺；他们具有极端军国主义性的同时，又异常沉静文雅；他们在傲慢自大的同时，又彬彬有礼；他们极端固执的同时，又非常富有顺应性；他们是极其顺从的，又非常忌讳任人摆布；他们是忠实的，又不那么守信；他们极其勇敢，又非常胆小怯懦；他们极端保守，又极喜欢新鲜的东西；他们对别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行动非常在意，同时当别人还未明白他们的行为不端时，又常败倒在罪恶的诱惑之下；他们的士兵是彻底服从的，然而又具有反抗性。

当我们认识到，弄清楚日本对于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时，我们对这些矛盾，以及除此之外，同样也是极其重要的许多矛盾就不能熟视无睹了。严峻的局面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日本人会做什么呢？不进攻日本本土能否使他们降服呢？我们是否应该对皇宫进行轰炸？我们从日本战俘那里能有什么收获？对日本军队以及日本本土进行宣传时，说些什么才能拯救美国人的性命，而削弱日本人的即使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抵抗到底的决心呢？对此，即便是在熟知日本人的人们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意见分歧。停战以后，在日本要把秩序维持下去是否需要永久地实施戒严法？是否需要动员我军同在山中各要塞拼死抵抗到底的日本人进行战斗？在国际和平可能实现之前，是否需要在日本掀起一场类似法国革命或俄国革命那样的一种革命？让谁做那次革命的领导者为好？或者就让日本国民这样灭绝？如何判断这些问题，在我们

中间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九四四年六月，我接受委托，开始研究日本。为了搞清楚日本人究竟是怎样的国民，我被容许充分利用作为一个人类文化学者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手段。当时正值初夏，我国终于开始了对日本大规模的攻势。在美国，人们一直说对日战争恐怕要持续三年、十年，也许更长。而日本人却说，这是百年战争。美军的确取得了局部性胜利，但是，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日本的公报从不承认海战的失败，日本国民依然深信自己一方占有优势。

到了六月，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最高司令部对于欧洲战区授予历时两年半的军事优先权，此时已没有必要。对德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在太平洋，美军已在塞班岛登陆，这是预示日本最终失败的一次大战役。自此，美军士兵一步步地逼近，和日军短兵相接。以我们在新几内亚，在瓜达卡纳尔、缅甸，还有在阿图、塔拉瓦和比阿克岛等地的作战经验，使我们完全清楚我们是在同一个多么可怕的敌人作战。

因此，在一九四四年六月这段时间里，迅速搞清我们的敌人——日本的许多疑问，至关重要、迫在眉睫。我们必须洞察一切问题，无论是军事上的问题、外交方面的问题，还是施行最高政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乃至向日军前线投掷宣传手册将带来的问题等。对于参战日军总体战斗力方面，我们必须知道的不仅仅是东京决策者的目的和动机，日本漫长的历史、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统计数

据，还必须清楚他们的政府指望从国民那里得到什么。我们必须努力弄清日本人思想、感情的脉络，以及纵贯这些脉络之中的特点和规律，了解他们在思维和行动的背后所隐藏的强制力。在迫于作出某种判断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权且把美国人采取行动前的思维习惯搁置一旁；而不是轻率地下结论说，日本人打算采取的行动，与我们处在同一情况下所要采取的行动大同小异。

我的课题研究是艰巨的。美日正在交战，战争中彻头彻尾地贬低敌人是容易的，然而，要通过敌人的眼睛来弄清敌人的世界观，却并非易事，况且我们必须通过这种方式了解敌人。我们判断日本人将要采取什么行动，并不是说如果我们和他们处于同样境地时，我们会怎样行动。我们必须理解日本人，理解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动，不是作为消极因素，而是作为积极因素来加以利用。通观日本人在战争中的做法时，与其把它当做军事问题，不如把它作为文化问题来加以研究。日本人战时也和平时一样，以其固有的习惯指导行动。那么，在应对战争时，他们显示出怎样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法的特殊之处呢？他们的指导者是怎样鼓动战争情绪，怎样安抚惊慌失措的国民，又是怎样在战场上使用士兵……这一切做法意味着他们把什么看做是自己可以利用的长处？为了弄清日本人在战争中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显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我必须仔细调查战争各个阶段的详细情况。

但是，我们两国正处于交战中这样一个事实本身，意味着条件是非常不利的。作为人类文化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实地

调查，无疑在两国交战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我不可能去日本，在日本家庭中生活，亲眼观察他们的各种日常活动，从而分清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我也不可能观察到，当他们作出某一项决定之前，自始至终作了哪些复杂的准备；更不可能观察他们培养孩子的过程。约翰·恩布理著的《须惠村》一书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文献，它是人类学者关于日本村庄的实地研究成果。可是一九四四年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这部著作并没有提到。

尽管列举了以上种种困难，但作为一个人类文化学者，我自信是具备利用某种研究方法和必要条件来研究对手的；至少我还没有完全失去同研究对象国人民直接面对面接触的机会，这也是人类学者研究问题主要借助的方法之一。我们这个国家有许多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我可以了解他们亲身经历过的具体事情，以探求他们判断事情的方法；根据他们的介绍，弥补我们知识的缺欠之处，而这些东西对于一个人类学者研究任何文化都将大有裨益。当时研究日本的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多利用图书馆来解剖过去发生的事件，分析统计数字，追踪文字和广播，对日本方面宣传词句中出现的变化加以研究。他们所寻求的答案，大都寓于日本文化的规则和价值之中。我确信，向实际生活中的人们探求其文化，将会得到更为满意的发现。

但这并不是说我不读书，不向曾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寻求帮助。有关日本人的很多文献和在日本居住过的许多有远见卓识的观察家们，给予我很多便利。这些是过去在亚马孙河源地和新几内亚

高地研究没有文字的部族的人类学者完全得不到的。那些部族没有文字，他们无法记述下自己的面貌。西方人对这些部族文化的解释，寥寥无几，并且大多很肤浅，任何人对于这些部落过去的历史都很茫然。实地调查者们在无从借助先前研究人员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必须搞清这些部族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的划分，以及宗教生活中以什么作为至高无上的东西加以信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研究日本的时候，我可以继承许多学者的遗产：一些嗜好新奇的人，记录描绘了日本人的生活细节；一些欧洲人和美国人写下了他们在日本的生动经历；日本人本身也有很多耸人听闻的自我揭露。日本人与众多东方人不同，他们有对于自己的情况毫不掩饰地大书特书的冲动，不仅写向世界扩张的计划，也写他们生活的琐事，他们的坦率常达到令人眩目的地步。当然，像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他们也并不是把自己生活的全部，毫无遗漏地全盘托出。日本人往往在写有关日本的情况时，常将一些确实很重要的事情忽略过去，因为他们把这些事情看得有如天天接触的空气一样习以为常，毫不在意；这在美国人写美国情况时也是如此。但相比较而言，日本人是喜欢自我暴露的。

我在读这些文献时，与达尔文在完成有关物种起源理论时所采取的做法一样，特别注重那些无法理解的问题。我一边读书，一边反复自问：从他们在议会演说的观点罗列中，我必须了解哪些事情？他们对一些本来无关紧要的行为给予猛烈的抨击，对一些目无法纪的行为反而满不在乎地认可，这种态度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

么？“这幅图画怪在何处呢？”为了搞清楚它，我又必须了解哪些东西呢？

另外，我还去看日本的电影、例如，宣传性的电影、历史方面的电影、描写东京以及日本现代农村生活的电影等。看过这些电影之后，我还要详细地对电影中的男主人公、女主人公以及反面人物加以分析。不是用自己的眼光分析，而是用日本人的眼光，同长期生活在日本、亲身体验过电影中那些场面的日本人一起进行分析。当我对一些问题搞不懂而束手无策时，他们则给予我帮助。无论是电影的情节还是动机，常常并不像我所理解的那样，只有通过对电影整个结构的构成方式进行分析，才能确实搞通它的意思。看小说也是一样，我所领会的意思和从小在日本长大的人所领会的意思，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在这些日本人当中，一部分人会立即为日本人的习性辩解，而另一部分人则只要涉及日本的事情，即表示憎恨。要问我从哪部分人中收益最大，是很难断定的。但是他们对于自己所熟悉的日本生活规范的诠释倒是一致的，无论是欣然承认或厌恶否定。

如果只是从你所研究的文化继承者那里直接选择材料，对其加以解释；那么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来说，他所从事的研究，就同曾经居住在日本的所有西方最有才能的观察家们所从事的工作毫无两样了。如果人类学者所提供的研究成果只停留在这一水平上，那么就意味着他不能给以往在国外居住的人们所完成的许多有关日本的研究，增添任何新的东西。然而，一个人类文化学者经过长期的磨

炼，往往具有别人所不具备的几种特殊的才能。他在研究者和观察家的广阔领域里，为了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而进行尝试，这未必是无益的。

人类学者了解到，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存在着多种文化。日本的社会制度和生活习惯与太平洋诸岛的原始氏族之间有许多类似或近似点；有的地方与马来西亚类似，有的地方则与新几内亚或波利尼西亚类似。考察这些近似现象是否意味着某种古代的迁徙或者接触，虽然是饶有兴味的，然而，我了解这些近似性的用意却不在于揭示历史上的联系；确切地说，我在寻找这些相同与不同之处的时候，是要从这些文化中逐一地了解其习俗是如何起作用的，并且从这一过程中理解日本人生活的线索。我还掌握了一些中国、缅甸和暹罗（现在的泰国）等亚洲大陆国家的情况，因此还可以将日本同这些同源于亚洲伟大文化的国家作出比较。人类学者通过对原始民族的研究曾经多次证明，这种文化比较是多么有价值。一个部落民族的传统习惯有时与其周围民族基本上一致，有时则经过自己独特的改造，以适应一定的生活方式或者价值观念，从而显得与周围的民族截然不同。在这一过程中，有时必须改变某些根本性的制度，这种变动虽然从总体上看来数量不大，但是却改变了这一部落民族的未来发展方向。对人类学者来说，从具有许多共同特性的民族之中找出他们所存在的差异是最有意义的。

人类学者还必须使自己尽可能地习惯于自身的文化背景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的差别。为了这种特别的需要，他们的研究技巧也必

须格外锐利。他们从经验中得知，由于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人们所面临的情况极不相同，因此不同的部落或民族会采用彼此不同的方式限定这些情况的内涵。他们在北极地带的村落里和热带沙漠中面临着前所未遇、远远超出他们想象力之外的家族责任及民族式经济交换制度。这不仅需要他们调查研究家族关系及交换过程的详细情况，而且需要他们注意到，这些制度对氏族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以及每一代人在什么条件下自幼开始继承祖业。

这种对不同的条件和结果的专业上的关注，能够在研究日本时得到充分的发挥。任何人都不会忽略日本与美国这两种文化之间所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区别，正如我们那句关于日本人的俗语所说的那样：无论我们干什么，日本人总是反着干！然而这种把区别绝对化的看法是十分有害的。其原因在于，如果研究者仅仅满足于区别大得无法理解这一简单看法，那么结果自然无法认识这个民族。人类学者的经验足够证明，即便是怪僻的行为也有其可理解之处。人类学者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更善于把差别作为专业上的财富而不是负担加以利用。没有任何其他事情比非常特殊的对象更能吸引他们全神贯注地投入其制度和民族的研究了，也没有任何其他事情比氏族式生活方式更能得到他们本能的注意；正因为这样，他们不是只选择个别的事实，而是必须把握事情的全体。

缺乏比较文化研究素养的人在考察西方各国的时候，往往放过很多的行动领域，把大量的事情都视为当然。因此，他对人们根据日常生活习惯和司空见惯的事情所作出的一切判断，都不做深入

的考察。然而正是这些判断，当它以特写镜头在全体国民的银幕上映现出来时，比起外交上的条约更能主宰该民族未来的发展方向。

人类学者必须加强对普通日常事务研究的技巧，因为他所面临的民族的日常生活与他自己本国的实际极不相同。他在着手考察某个怀着极端敌意的原始氏族或者某个极端怯弱的部落民族时，当需要想象一下该民族的行动步骤或感受一下他们面临的某种特殊环境的时候，他才会明白他必须对某些研究开化民族时不予重视的细节格外留心；他会有充分的理由说明这些细节是切中要害的，他知道如此研究才能带他走出迷宫。

在这方面，日本的实际值得尝试。只有认真观察国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才能充分地理解人类学家的这一论证前提的重要意义，即任何原始部落民族或者处于文明前列的民族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会人类的行为的。人们的行为或观点无论多么怪异离奇，但是他们感受或思考的方法不可避免地与其存在具有一定的联系。因此，我自己越是对某种做法感到迷惑不解，越是确信能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找到这种奇怪现象所产生的共同基础。如果研究导致我的关注点深入到日常琐事中，那就更好了，那里正是人们学习的场所。

此外，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我还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最孤立的行为都与周围环境存在着某种系统联系。我很重视如何把成百种具体现象纳入一个包罗万象的总形态而加以分类。每一种人类社会都必然为它自己创造出某种生活，这种生活在它所面对的环境中选择出一些道路以及估量周围环境的方法，生活在这一社会中的人